



楊仁愷
著

國寶
沉浮錄

〔足本〕

◎ 辽宁人民出版社

國寶沉浮錄

〔足本〕

楊仁愷 著



© 杨仁恺 201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宝沉浮录 / 杨仁恺著. —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20.1

ISBN 978-7-205-09520-8

I. ①国… II. ①杨… III. ①故宫—历史文物—研究资料②中国画—研究资料—中国—古代③汉字—法书—研究资料—中国—古代 IV. ①K879.4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02944 号

出版发行: 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电话: 024-23284321 (邮 购) 024-23284324 (发行部)

传真: 024-23284191 (发行部) 024-23284304 (办公室)

<http://www.lnpph.com.cn>

印 刷: 辽宁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 185mm × 260mm

印 张: 43.75

字 数: 760 千字

出版时间: 2020 年 1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2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特约编辑: 王志勇 常 策

责任编辑: 那荣利 盖新亮

装帧设计: 丁末末

责任校对: 吴艳杰

书 号: ISBN 978-7-205-09520-8

定 价: 198.00 元

故宮教佚書函見闕致略

羊眉署



[序言]

我与杨老相识已经数十年了。在我的认识里，杨老不仅仅是一位闻名遐迩的大鉴定家，更是一位大学者、大研究家，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先辈，是学界的典范。

一想到杨老，我的第一感觉，杨老就是一位读书人，是书生，是大学者，是研究家。我曾写过一篇文章，也是这番话开头，这回我想换一个说法，但思来想去，仍无法动摇这个第一印象，可见他在我心目中的学者地位是不可更改的。

杨老一生著述等身，累计千万字以上，几乎所有文章或作品我都认真拜读过。其中的《国宝沉浮录——故宫散佚书画见闻考略》一书，我个人认为其价值不可估量，在中国艺术史上永远会据有重要一席。

《国宝沉浮录》，这是一部专门记载辛亥革命胜利后末代皇帝溥仪从故宫盗取书画珍宝的书。溥仪利用他当时的特殊条件，盗取了故宫所藏的大批书画珍宝，后又勾结日本帝国主义成立伪满洲国，背叛祖国，背叛民族。伪满洲国成立后，溥仪借助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将他盗取的大批珍宝从天津运抵长春伪皇宫。抗战胜利，日寇投降，溥仪又挟宝潜逃，被我缴获。但留在伪宫小白楼里的大批书画珍宝，被伪满洲国看守士兵哄抢争夺，以致撕毁和流散，造成中国历史上最近、最惨的一次书画珍宝的浩劫。

杨老一向关心溥仪盗宝这件大事，想弄清楚此事的来龙去脉，并想尽可能地抢救这批国宝。恰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杨老由政府派往东北调查清理征集这批流散国宝，因而对这次小白楼事件及溥仪盗宝的前前后后有了最深刻的了解并亲自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在这个过程中，杨老还为国家抢救了上千件文物，著名的《清明上河

图》就是他在仓库的杂品中发现的。原先被作为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真迹实际上是一件后人的画本，是杨老发现了张择端真本，才让这件国宝重放光彩。杨老还两次在荣宝斋遇到一位从东北来的青年，拿着一包古书画的残片来卖，杨老竟从碎片中拼出米芾《行书苕溪诗》真迹来，从而使这件国宝得以遇救，同时被抢救的还有几十件，国宝巧遇“国眼”，劫后重生，一时传为佳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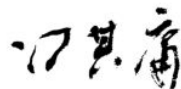
杨老的《国宝沉浮录》，详细地记载了溥仪从故宫盗宝偷运至天津张园，之后溥仪依靠日本人力量从天津逃往长春，甘当“儿皇帝”，又借日寇之力将国宝运抵伪宫，以及后来日寇投降、溥仪潜逃被截，伪宫宝物因哄抢流散，文物古董商人趁机发财，直到后来国宝部分回收，等等，此书全部据实详录。

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杨老以他卓越的书画鉴定能力，对溥仪盗宝清单上的国宝书画，尽量作了学术性的鉴定和考论，并附有大量的图版，使得这部书成为可读性极强而专业水平又极高的好书，从而又使近代史上溥仪盗宝事件得到了最真实详尽的记录。

我国历史上每逢大乱，必有书画国宝的被毁和流失，但以往只有简略的记述，从未有如此翔实的专著。所以杨老这部书，又是我国文化艺术史、文博史上具有创造性的专著，发前人之所未发，作前人之所未作，是书的出版，奠定了杨老卓越的古书画鉴定大家地位。

我写这篇短文，也只是以蠡测海，最多不过是得其一勺而已。想了解更多有关杨老以及书画国宝的人，还应该直接去读他的书，因为只有观沧海而后能知沧海之大，只有登昆仑而后能知昆仑之高！

是为序。



二〇一六年二月一日于京华瓜饭楼

[二〇〇七年版自序]

一九九九年七月，拙著《国宝沉浮录》增订本由辽海出版社印制发行，次年台北新中原出版社出版了增订本的全彩版，向海外发行。时过七八年，如今增订本已难以购到，于是上海古籍出版社与我协商，拟由该社印制彩图版，以应读者需求。我表示接受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好意，随即向国内外公私藏家以及有关机构咨询《佚目》（即《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后文均简称《佚目》）书画作品最新发现情况。很快，借助查阅资料以及杨武等诸位友人的帮助，又有三十多件《佚目》中的历代名作浮现出来，为研究《佚目》书画增加了宝贵材料。彩图版以原增订本为基础，在第八章后补充了若干文字，又于简注中将发现作品现状加入，以备读者参考。

《佚目》书画固然在不断涌现，但仍有不少作品有待追寻，这其中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我们只能选择耐心地期待。追寻《佚目》书画的工作不能预期何时可以结束，增订补充本书的工作也就随着作品的发现而继续下去，何日彻底完工，实在没有限期。我们既然承担了这份责任，就应该始终如一地期待着有新的奇迹出现。如今的我有一个期盼，伫候国内外关心《佚目》书画的读者能够投入到这项历史性“探宝”任务中去，若是出现超乎意外的成果，则不胜企予望之。

楊仁愷

二〇〇六年春节

[一九九九年版自序]

我所撰著的《国宝沉浮录》一书，于一九九一年出版问世之后，没有想到竟引起各方面的关注，新闻媒体说其为一九九一年畅销新著之一，而国内外友人也纷纷来信向我索书，一时应接不暇，实出我始料之外。原意是想把过去做的工作整理出来，向大家有个交代，并非妄图窃取不实之誉，这倒使我于心不安，一时不知所措。此种心情，我在一九八九年所写的自序中已有所涉及，想必为广大读者所谅解。

拙著面世近十年过程中，我又陆续掌握一些可资补充书中的材料，把它积攒下来，以作日后补缺之需。再就是近年来全国文物拍卖行业兴起，各大城市的拍卖公司竞相展现实力，连同国外的佳士得、苏富比诸家在业务上的竞争，市场上竟先后出现《佚目》内外的名贵书画达数十件之多，无疑对拙著具有拾遗补阙的益处。

本当将先后发现的所有新资料补充进拙著里去，怎奈出版社几次再版时竟事先没有通知作者我本人，依然按照初印本付梓，致无法将新的发现增补进去，殊觉遗憾。此外，有关拙著第三章第一节“长春伪宫土崩瓦解前后纪事”和第四节“长春伪宫小白楼风波”两节中未了结的事件，一直未作交代，对读者满怀歉意，总有内疚之感。所幸近年国内报刊上相继发表了有关信息，令我喜不自胜，再加上不断有新的《佚目》书画出现，促使我下决心对拙著增订。然而，落实计划殊非易事。香港徐氏艺术馆徐展堂先生于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在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新馆开幕式上，向我提出拙著《国宝沉浮录》可由他交香港大学出版社张先生精印发行，当时要我回国经香港时和张先生联系出版，盛情可感。但我的行程匆匆，手边的工作又极其纷繁，一直

没有将此事放在日程之上，有负徐先生雅意，至今犹抱歉不迭。尽管受时代的限制，一九九一年印行的拙著不够理想，但我还是要感激原来的总编辑龚继先和责任编辑黄振亮先生，两位付出的劳动确实不少。特别是黄振亮先生，他担任编辑多年，知识广博，经验丰富，我和他为拙著的出版打了很长时间的交道，彼此合作十分愉快，结成了文字之交。不幸的是，时隔一年，他患不治之症与世永诀，令我为之悲伤不已。

据友人介绍，台湾一家出版社有出版《国宝沉浮录》意向，我想借此对拙著予以增修，以偿夙愿。为了不影响原著的结构，也是为了便于读者深入理解，我没有进行大的改动，只是将新发现的资料增补进去，增补的文字主要体现在第三章的第一、第四两节以及第八章中。全书基本保留原有的章节顺序，增加了第八章的内容，原第八章改为第九章。再就是重新对文字图版校勘一次，并增添部分图版，方便读者阅读参考。

最后，非常感谢辽海出版社助我实现夙愿，能让《国宝沉浮录》增订本得以出版发行。殷切期望国内外广大鉴藏家和各界爱国人士大力协助，使长春伪宫散佚的全部古代法书名画尽早地浮现出来，使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有一个完满的结局。

楊仁愷

一九九九年二月

[一九九一年版自序]

这本书稿的撰写，前后历时三十余载，终于在一九八九年春季全部清稿完毕，如释重负。此中心情，甚为复杂，唯过来人体会最深。愿借此机会将撰述的本旨和中间过程，略及一二，置诸篇前，掬诚奉告，或有助于读者披览。

鉴于我国数千年历史，中间改朝换代，文物典籍屡遭浩劫，给悠久传统文化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致使某些环节史阙无征，前人往往为之兴叹不已。我自惭不敏，胸无大志，独留意于历史文物的探究，重点放在古代法书名画方面，做一些拾遗补阙的工作，冀尽添砖加瓦之微劳，此种意向也许与我从事历史艺术博物馆业务的积习有关。进而言之，这个起因还要往前推移，在拙著《沐雨楼书画论稿》“代序”一文中已有所涉及，但观念的最后形成，仍然是在后三十年内逐渐奠定起来的。

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逊位，从清宫窃出历代法书名画千余件，在我国历史上委实是一桩大事。一九四五年八月，伪满政权随日本军国主义战败投降而土崩瓦解，这批书画又从长春伪宫散出。从此国宝沉沦，流向全球，举国上下无不关切，我当然也不例外。最初的心理是希望散佚的国宝不至于渺无踪迹，期待有机会能再与名作晤对，一饱眼福，于愿已足。自我参加国家文博工作之日起，思想上发生了较大的转变，树立起主人翁的责任感，想方设法试图将散佚在各个隐蔽角落里的国宝发掘出来，使之重放异彩。然毕竟时过境迁，想象不能代替现实，故用力虽多，而收效甚微。直到一九五二年春，我受命赴长春清理伪宫流散文物，得以直接参与其事，同社会上各种各样人物打交道，得到了锻炼，增长不少经验和知识。由于限期短促，只好昼夜兼程，

跑遍东北和华北地区，酸甜苦辣，滋味备尝，犹孜孜不倦，以苦为乐。当发现一件国宝时，精神上所得到的慰藉比任何物质上的享受要高出不知多少倍！所谓“发潜德之幽光”，使我思想上常为之激动不已。

又鉴于历史上官家文物，多次聚而复散，历朝也曾派员向民间搜寻查访，所留下来的文字记载多语焉不详，殊觉遗憾。溥仪盗宝事件所产生的危害，影响深远，而当时北洋政权当局照例派官员去现场清点，如果不是发现宫廷太监所记“赏溥杰”账单，即使动员大批人马，花费九牛二虎之力，消耗巨额金钱，穷年累月，未必能弄个水落石出。当时官场一贯以应付思想行事，根据账单，编成《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一本薄薄的册子，以此向国人有所交代。事实上，此册子既不能说明全部问题，也未指出事件本身的严重性，更谈不上有多少科学价值。单就账目而论，与后来所发现的数字相较，账册漏记竟数以百计，而其中尤多国宝。仅此一端，即可发人深省。如果就我们后来所发现的依然按他们所编的《佚目》予以增减，无异重蹈覆辙，反而远逊于前人的著录和访求笔记一类，实有所不取，亦有所不甘。故宫书画散佚既属于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我们有责任通过具体的人和物做出如实的描述，虽不敢使之成为信史，至少应尽可能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本于此义，我前前后后与若干当事人有过多对面接触，并留下厚厚的记录；对发现的大批法书名画作品，进行过反复的推敲研究，然后按照客观的进程，分为章节，加以铺陈，以事件中人物活动为经，以作品历史艺术分析为纬，见人见物，庶几不至于流为官样文书。话虽如此，仍难免专业味道较浓，或者涉及一些历史背景的叙述，不无滞涩之处，对此我已有意识地加以克服，但未必能尽如人意，实在有负读者期许。

本书初稿在“文革”前夕已基本写成，因受当时“左”倾思潮影响，习而不察，直到定稿时做了一番回顾，不禁为之汗颜。我自己历年来多次受过“左”倾光顾，蒙受多种形式的羞辱，反而不以为怪，并将此转嫁给第三者，似乎以为如此可以减轻自己心灵上的负荷。此种阿Q精神，我们知识界中亦不乏先例。当我察觉之后，随即对初稿作了无情的解剖，并进行全面修改。由于内容涉及广泛，中间不无遗漏之处，疏忽之责，应由作者承担。

当灾难深重的“文革”降临到全国每个角落之时，我所有的文稿连同图籍诸类概被查抄，由所在机关单位的“革命造反派”以组织名义名正言顺地予以没收，并给予

严格检查。拙著《沐雨楼书画论稿》中有一篇研究明人史可法手札的文章，所使用的第一手材料即被查抄，本书初稿也不例外，遭到同样的命运。当时人身安危尚且朝夕不保，一切身外之物早已无法顾及。一九六九年年末，我从“五七干校”回来，又被命令带领全家老小赶往艰苦的辽东山区“插队落户”，此是“革命组织”的安排，无法违抗，只能唯命是从。我把下乡劳作看得很轻，但我把被抄走的所有文稿（包括已刊发的在内）看得很重，因为这是我多年精神劳动的成果，即或是远非成熟之作，也总有离不开的情感，不忍让“造反派”当作废纸丢弃。于是，我一再鼓起勇气，据理力争，甚至以不发还文稿就不去“插队落户”为“谈判”条件，终于赢得了“胜利”。除一部分师友们送的书画（均具我的上款）和稿件丢失外，本书初稿居然无恙，我不禁为之额手称庆，惊喜之情，不可名状。书稿随我一家老小插队山区两年有余，每当劳动之暇，时常翻阅，加以修补。我的老伴刘文秀在乡下养鸡喂猪、做饭洗衣之余，为我查抄材料，并随时防范屋漏淋湿书稿，终日疲惫不堪。她是四十年代大学生，攻读心理学和教育学，作为大中专的师范教师，本不应随我同受折磨，但她不伎不求，五十年休戚与共，苦难同当，支援我的事业，教育子女成长。本书如果没有老伴助我一臂之力，其结果很难设想。

前人对自己的文稿总是要经过多次推敲，所谓“九朽一罢”，力求完美，直至无懈可击而后已。此种求实精神，值得学习，当奉为圭臬。然我的治学态度远远不如前人，相去不可以道里计。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尽管不断发现新资料，并不断予以补充和修改，仍然存在不少疏漏和讹误，毋庸讳言。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我曾多次应邀访问美国、日本、加拿大诸国，或参观收藏东方文物丰富的博物馆以及私家藏品，或出席各种性质的国际学术讨论会，聆听各方专家学者的卓越论点，眼界为之大开，并对流往域外的《佚目》珍宝得以寓目，从而充实了本书的内涵，这是当初所没有想到的意外收获。总之，修改、补充，补充、修改，一直没有停顿过，最后一次大改动是在定稿之时。是时我既窃喜又兴奋，何以故？之所以窃喜，是由于前面提及的全书内容有不同程度的“左”倾思想，如果过早地将其刊布流传（有出版界友人曾竭力促成），我会抱恨一生，后悔莫及；之所以兴奋，我终于逐渐认清过去，“觉今是而昨非”，幡然醒悟，摆正航向，为时未晚。再使我感到欣慰的是，由于本书延迟二三十年付梓，能纳入国内外更多的新资料，更能显示出国宝沉浮的来龙去脉，有助于读者对这段历

史有较为全面的、清晰的认识。

我在撰稿时有意留心于内容的表现形式，不使其成为枯燥乏味的资料堆砌，也避免徒托空言的纯学术性说教。既要尊重历史事实，又要尽量照顾全面，不存任何偏见。对前人学术上的卓识高见，应予肯定；于各家文献著录的采取，通过实物原迹的验证，不可囿于成说。历史在无止境地向前发展，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如果抱残守缺，故步自封，历史就会停滞，科学归于枯竭。我不愿作为赘瘤，总想跟上时代，不因年岁老大而宽恕自己。当然，主观的自强、自励起决定的作用，但不应否认客观条件在某种契机中也是关键性因素。如上面所提到我的老伴以及二三知己的多方鼓励，质疑问难，启迪独多。不应忘记出版界的继先、振亮诸友人，对这本书的撰写，一再督促，并提出具体修改意见。如书名《国宝沉浮录》就是副编审黄振亮先生斟酌后提出的，比原名《故宫散佚书画见闻考略》所体现的十足学术气味要新鲜明快得多，而其同样可以概括全书的内涵，容易为一般读者所接受。但是，我的积习一时难改，思考再三，仍然不忍放弃原来的书名，认为两者可以并存不悖。所以如此安排，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原题签为沈雁冰（茅盾）先生所书，沈老生前对我这本书的撰述甚为关怀，听我说起写它的动机和遭遇，深表同情，故而慨然为之题签，知遇之德，时萦胸臆。沈老一代宗师，文章道德举世所钦，即是单从纪念的意义着想，不能没有他的光辉遗墨刊诸篇首。因而，以沈雁冰先生题签作为副题。

人贵有自知之明，说来容易，做到尤难。像我这样一位缺乏素养的文博从业人员，不度德量力，妄图将历史上的一桩大事件，以及如此庞大而复杂的内容呈献给社会，而且使其中的人和物都做到明确无误，又何其难哉！我深知才疏学浅，本不堪此重任，唯恐时过境迁，历史资料散失湮没，受责任感的驱使，勉力以赴，不计功罪。伫望国内外学者和专家，在不久的将来，撰出更具有科学性、真实性、艺术性和可读性的巨著问世，我不胜殷切期待之至！

杨仁恺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二日于成都客次

楊仁愷先生千古

長辭
尚有沈浮錄
國寶
珍藏國運隆

翁萬戈敬輓於美國之
新漢普沙州萊溪居

二十又八年二月

墨吐能乾液不臭經羅盜先抹經錢一函國寶沈
浮錄年苦遼東管幼安 仁愷先生書自遼寧來也新

加坡杜過加 廖如晴甚蒙出所著國寶沈浮錄一書名贈感成以

部一有存報即乞清誨

辛未歲暮弟潘文



豈止拾遺補闕添
磚加瓦竇發潛
德之幽光後學膏
奉為圭臬

仁愷先生律著國寶沉浮錄自序
多謙語因擷以追思
先生不朽之學術成就後學傳仰慕



仁愷先生精鑒別表亂後經
其極敗之清宮流失書畫甚數

國寶功臣

所著之國寶沉浮錄為鑑賞經
典之作奈與先生相交三十年得益
良多謹識數言以示懷念 黃君宜

